

萨满信仰
民族文化

Saman xinyang yu
minzu wenhua

金 香 色 音◎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多元信仰
民族文化

*Daman xingyang qu
minzu wenhua*

金一香 色一音◎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满信仰与民族文化 / 金香、色音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ISBN 978 - 7 - 5004 - 8449 - 3

I. ①萨… II. ①金… ②色… III. ①萨满教—宗教
文化—文集 IV. ①B93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0546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君升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396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中国的民族学与萨满教研究	郝时远	(1)
中国萨满式文明的宗教人类学解析	色 音	(9)
世纪之交的萨满教	[匈牙利]米哈伊·霍帕尔(M. Hoppal)	
	郭淑云译 杨玉晨校	(25)
萨满教与原始天象地理志	富育光	(33)
满族萨满神灵初探	宋和平	(47)
萨满治病与原始医学	郭淑云	(84)
蒙古萨满教词汇的文化语言学阐释	斯钦朝克图	(115)
阿古一布利亚特人的寻根活动：萨满教复兴的新阐释	[日]岛村一平著 包路芳 时春丽 萨茹拉译	(160)
朝鲜的萨满教	[韩国]赵兴胤著 金 香译	(191)
索伦鄂温克萨满口述史	李尔只斤·吉尔格勒	(210)
科尔沁萨满教的仪式活动及法器用具	巍 山 色 音	(245)
北方民族萨满教的兽主崇拜	孟慧英	(259)
灵魂附体型萨满教的危机		
——关于萨满教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的探讨	[日本]小松和彦著 苏日嘎拉图译	(278)
韩国萨满教和外来宗教之间的文化相生	[韩国]赵兴胤著 孟慧英译	(293)

2 萨满信仰与民族文化

- 浅析成吉思汗祭奠的萨满教根基 乌云格日勒 (309)
库斯古勒省达尔扈特部落萨满教的法衣、法器及
相关习俗 [蒙古] S. 巴达姆哈坦著 黄 莹译 (324)
清代宫廷祭祀中的萨满教遗存探析 色 音 (351)
柯尔克孜族萨满的咒语和神歌 古丽巴哈尔·胡吉西 (383)
从萨满教信仰中透视原始文化
——评郭淑云著《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
透视》 王晓红 (414)
孟慧英著《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评介 雷丽萍 (419)
系统的整合 新颖的方法
——介绍色音的《东北亚的萨满教》 翟媛媛 (424)
附录:中文萨满教研究论文目录索引 (431)

中国的民族学与萨满教研究

郝时远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所以，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对多民族的源流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从甲骨文、钟鼎文到竹简，从《春秋》到以《史记》为代表的官修正史，从方志、游记到各类野史，都包含了对中国形成过程中的中原与周边、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载。虽然这些记载基本上限于一种描述，但是有些记载已经概括出“民族”的基本特征。例如，据《礼记》的记载，中国夏代时就存在着五大民族集团。“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①从这一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原的农耕民族与周边四邻的狩猎、游牧民族在社会发展方面已形成较大的差距，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古代民族集团在群体特征方面存在着生产、生活、语言、习俗等多方面的差异。

^① 《礼记》卷三《王制》，《四书五经》，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影印本。

2 萨满信仰与民族文化

同时，“民族”一词在唐代就见诸中国的历史文献。如唐代李荃所著兵书《太白阴经》的序言中即有“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说。^①当然，这里所说的“民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但是就这一词汇来说，至少在唐代就出现于中国的史料之中，而非近代从日本传入。尽管如此，中国并没有产生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学研究。中国学科性的民族学研究是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逐步开展起来的。

一 西方民族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回顾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如很多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一样，西方民族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同时，早期一些外国民族学家在中国进行的田野调查工作及其著述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也为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实证参考。从1898年王树枏发表《欧洲族类源流考》到1903年刘师培撰著《中国民族志》，^②标志着中国民族学研究开始起步。但是，当时国人和学界对国外民族学的学科性了解仍然是极其有限的。1903年，中国著名翻译家林纾、魏易根据英国人鲁威（J. H. Loewe）的英译本，将德奥民族学家哈伯兰（Michael Haberland）的著作《民种学》（Ethnology）翻译出版，开启了译介国外民族学知识的先声。此后，中国学术界通过留学生和翻译作品，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西方民族学的知识。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在学术舆论方面形成影响。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分别

^① （唐）李荃：《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清咸丰四年长恩书室丛书本。

^②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3页。

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和人类学组。中央研究院首任院长、中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教授亲自担任了民族学组主任。在此前后，中国的许多著名大学开设了人类学、民族学课程，清华大学设立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抗日战争后期，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建立了边政学系；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暨南、浙江、中山、清华、辅仁等大学建立了人类学系，台湾大学建立了考古人类学系。这些研究和教育实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早期学科性发展。

在中国民族学步入学科性发展的进程中，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也得到传播。如蔡和森所著《社会进化史》就是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方面的早期代表。在学术理论陆续传入的基础上，中国学术界许多老一代学者致力于开展学科建设和专业人员培养。其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努力最为重要：

一是推介国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如吴文藻、杨望、戴裔煊等人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国际学术发展情况，有一些重要的论著发表。许多关于民族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也在那个年代译为中文。又如凌纯声、徐益棠、张少微、吴文藻、柯象峰、吴定良等学者分别参考国外资料，结合自身田野实践经验，编写了较为详细的民族学、人类学及边疆调查研究提纲和图表。

二是对民族学学科作出清晰的定义。许多学者在他们的学科定义中，强调了民族学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学科，从而把握了民族学的研究重点，使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明确了学科定位，并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和认识。

三是通过田野工作实践（包括体质测量）推动中国民族学事业的发展。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建立之后，先后派出研究人员

4 萨满信仰与民族文化

对东北赫哲族、浙江畲族、广西瑶族、湖南苗族、滇缅边境民族、台湾高山族等进行调查研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学者分别到北平、河北、山西、山东、福建、广东等地进行田野调查，研究社会结构、家族制度、婚姻和亲属关系等问题。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学者也进行了海南黎族、苗族、广东客家、瑶族和疍民等族群的调查。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民族学家在西部地区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及滇、贵、川、甘、青、新疆和西藏等地，形成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一个高潮。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被土地束缚的中国》，林耀华的《金翼》和《凉山夷家》，杨懋春的《台头：一个中国乡村》，许烺光的《祖荫下》，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苗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等，就是那个时期人类学、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杰出作品。

四是注重民族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许多老一代学者采用国际通行的方式培养中国自己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人才，如采用国际通用的教科书、采用研讨班方式上课、注重田野调查等。当时，北平燕京大学的吴文藻教授和广州中山大学杨成志教授在学术梯队的培养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

五是对学科发展情况做出及时的总结和评论。一些学者经常写文章说明国内学术研究情况，有些学者还对学术研究的不足进行批评，分析学术发展的问题，有些与国外学者直接展开对话等。^①

这些工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这些学者在比较广泛的田野调查实践中，在关注和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方面，对萨满教也开展了专门的研究。其中，凌纯声对赫哲族萨满

^① 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教的调查研究并在 1934 年发表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即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萨满教的学术著作。

二 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发展

如上所述，在中国浩繁的历史文献中对多民族源流的记载十分丰富，其中有关萨满教现象的记载也很多。但是，中国对萨满教的科学的研究相对于俄国等欧洲国家而言起步很晚。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除了凌纯声先生对赫哲族萨满教的研究外，并无其他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民族学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研究机构和人员都很少，而且从 30 年代末期举国进入抗日战争阶段，科学事业的发展难以推进。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从 50 年代初期开始由国家推动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为整个民族学研究的学科发展、专业人员培养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延续了近十年的全国性田野调查工作中，萨满教研究也成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内容之一。不过，当时主要处于资料收集阶段，并没有展开研究。有关萨满现象只是在 60 年代中期形成后来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基础——白皮书——中有所涉及。而从 1966 ~ 1976 年，中国又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之中，包括民族学在内的所有科学事业都处于停滞状态。

从 1977 年开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立开始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民族学研究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萨满教研究方面，中国的学者开始通过翻译和学术交流了解到国外有关萨满教研究的信息和学术成就。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所做的工作是

6 萨满信仰与民族文化

值得称赞的。^①这些译介工作，对中国民族学界的萨满教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学界的萨满教研究形成了专业化发展的趋势，除大量的学术论文相继发表外，一些学术著作也纷纷面市。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贺·宝音巴图的《蒙古萨满教事略》（1984），秋浦主编的《萨满教研究》（1985），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编的《萨满教文化研究》（1988），乌丙安的《神秘的萨满世界》（1989）。在这些著作中，中国学者开始形成萨满教研究的一些思想体系和学术特点。例如，在《萨满教研究》一书中，作者将萨满教起源、发展的理论主要集中于宗教观念演进的模式上，依据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过渡来区分萨满教的不同发展阶段。在《神秘的萨满世界》一书中，作者则把萨满教作为典型的原始宗教形态，从文化渊源的角度加以研究。同时，在众多的论文中，也反映出从事萨满教研究的学者们不同的学术价值取向。宗教哲学研究方面，如乌兰察夫的《蒙古族原始宗教观念初探》（1986），富育光的《论萨满教的天穹观》和《萨满教天穹观念初考》（1987），色音的《试论蒙古族原始宗教——萨满教》（1987）等；历史学研究方面，如伍韧的《萨满教的演变和没落》（1981），吕光天的《论蒙古族和满族萨满教消亡的历史条件》

^①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前后把策·达赖的《蒙古萨满教简史》（丁师浩译，1978年）、土耳其学者阿布杜卡迪尔·伊南的《萨满教今昔》（1979年油印）、苏联学者阿列克谢耶夫的《西伯利亚突厥语系民族萨满教》（孙运来译）、波兰学者尼斡拉滋的《西伯利亚各民族之萨满教》（金启宗译，1978年）等书翻译成中文作为内部资料编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也把道尔吉·班札洛夫的《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西德波恩大学教授海希西的《蒙古宗教》、苏联学者M.海洛夫的《布里亚特萨满教研究史》等书翻译成中文编入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的各辑里，等等。

(1981)，孟慧英的《论〈尼山萨满〉的历史性质》(1987)，程迅的《蒙古萨满教与唐王征东》(1988)等；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方面的研究，如贺灵的《锡伯族〈萨满歌〉初探》(1987)，郎樱的《〈玛纳斯〉与萨满文化》(1987)和《北方民族鹰神话与萨满文化》(1988)，色音的《蒙古萨满教巫祝传说的历史演变》(1988)，汪玲玲的《萨满教与伊玛堪》(1988)，富育光的《满族萨满教星祭俗考》(1988)等。当然，作为萨满教研的主流学术取向还是以宗教学研究最为突出。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不同民族的萨满巫俗进行研究也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如伍韧的《萨满教中的“萨满”》(1982)，张云的《西藏苯教与北方萨满教的比较研究》(1988)，郎樱的《西北突厥民族的萨满教遗俗》(1988)，贺灵的《锡伯族〈萨满歌〉与满族〈尼山萨满〉》(1988)等，在运用平行比较和影响比较等方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初开始，有关萨满教的专题性调查也陆续展开，许多新鲜的萨满教资料得以发现、发掘，在此基础上一大批考察报告相继问世。例如，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满都尔图、夏之乾教授在新疆地区进行了多民族的萨满教调查，其中对新疆锡伯族萨满教调查及其完成的《察布查尔锡伯族的萨满教》调查报告，成为中国民族学界首次介绍锡伯族萨满教情况的成果，它为后来的锡伯族萨满文化发掘和研究奠定了基础。1987年，几位锡伯族学者将发现的手抄于1884年的“萨满歌”翻译成汉文，公布于世。这篇材料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推动了锡伯族萨满教研的深入开展。1986年，白翠英等研究人员在内蒙古科尔沁地区进行了萨满教考察，通过录像和录音等方式对三十多位蒙古博（萨满）的调查和采访，以形象的方式首次将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博的残留现象公之于众，从一

8 萨满信仰与民族文化

个侧面反映了蒙古族的萨满教遗迹。在此期间，五六十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成果也陆续出版，其中如《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1987）、《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1986）、《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1985）等原始资料的刊布，为这个时期萨满教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基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社会变迁，萨满教研究在不断开阔理论视野的基础上，也特别重视对日益趋向于消失的萨满教现象进行实地调查、资料收集和整理刊布。例如，70年代末以来，在满族发现了一批主要由萨满和裁立（萨满助手）书写、保存的满语萨满文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萨满文本是萨满祭祀活动所依托的样本，比较集中、完整地展现萨满教最核心的内容，囊括了在一般调查中萨满们守口如瓶的关于神灵、神界的完整观念，详细记述了满族萨满教仪式的内容和过程。各氏族的神本几乎都经历了从口传到本传的漫长过程，其中文化积累深厚、内涵丰富，是萨满文化史上罕见的珍品和奇迹。萨满文本的保存方式使得这批材料实实在在，真实可靠，科学价值很高。学者们对这些文本进行了认真翻译和研究，并陆续刊行问世，如石光伟、刘厚生著《满族萨满跳神研究》（1992），宋和平著《满族萨满神歌译注》（1993），宋和平、孟慧英著《满族萨满文本研究》（1998），这些译本和相关评介、研究成果的出版，为推动萨满教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萨满式文明的宗教人类学解析

色 音

中国文化史表明，以儒家文明、道家文明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和以萨满式文明为代表的民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两大部分。前者是上层文化，后者是基层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二者同样重要。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中国学者历来偏重“精英文化”的研究而忽视基层文化的研究。

中国除儒家、道家文明之外，还有一种萨满式文明的观点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提出来的。他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提出：“萨满式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①这一观点在中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起到了“名人效应”。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考古学、历史学界兴起的“萨满教文化热”便是这名人效应的产物。而在国外，有的学者将这一观点引申到整个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提出了整个世界古代文明就是一种萨满式文明的观点。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萨满教与人类最初文明的关系，认为人类最初的文明就是萨满文明。例如从神话的角度来看，世界各地创世神话，事实上都可以包括在萨满教神话之中，故萨满教创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世神话亦称作“世界神话”。匈牙利学者霍帕尔的观点可以作为这个时期国际萨满教研究的特征。他认为萨满教可以被称作是一个复杂的信仰系统。萨满教是一个中性的称呼，可以包括在任何学科中。古代萨满不仅作为一个神职人员在古代人的意识形态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还作为巫医、诗人、歌唱家、思想家、艺术家等在世俗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整个古代萨满教文明，就是人类最初的文明。^①

笔者认为，张光直先生的观点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下面我们根据萨满教的最基本的特征和结构要素来分析一下中国文化中哪些文化现象可以看作萨满文化现象。

一般认为，萨满是能够进入忘我失神为标志的神灵附体状态的人物。根据迷狂状态的不同表现形式可分为灵魂脱离身体的脱魂型萨满和外面的精灵进入体内的凭灵型萨满。萨满在人和神之间发挥着媒介作用。从结构形态来看，萨满教由神话要素、媒介要素、仪礼要素三大要素所组成。下面我们根据上述特征和结构要素分析中国文化所蕴含的萨满教成分。

首先，看一看中国古典神话所反映的萨满教观念。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天地人神沟通，宇宙山、宇宙树成为通天达地的天梯的观念比较普遍。《山海经》里就有多处记有天梯的内容。如《海外西经》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内经》云：“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山海经·海内西经》郭璞注：“昆仑虚……盖天之中也。”可见，中国远古神话中某些神山起着萨满教神话中所描绘的连接天

^① 引自汤惠生《关于萨满教和萨满教研究的思考》，《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地的宇宙山之作用。登葆山、肇山、昆仑山等都是类似于萨满教中的宇宙山的神山。而“柏高”则是类似萨满的通天巫。“柏高”和北方民族的萨满之间是否有词源关系也值得研究。如蒙古语中称萨满为 böge，古突厥语中也有类似的巫名。“柏高”的古音是否与此接近，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献里一些神树也有天梯的性质。《山海经·海内南经》云：“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纁，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柰，其木若芭，其名曰建木。”《淮南子·地形篇》云：“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据《原始人心目中的世界》一书：“古代神话里，不仅一般人要想登天必须凭着某些具体事物，就是连神性非凡的天帝们、群巫们要登天也必须如此，具有天梯性质的山不是一座，那么充当天梯的树也不只一株。在古代神话里，具备天梯条件的似乎还有《海外北经》里的三桑、寻木；《海外东经》里的扶桑；《淮南子·地形篇》里的若木。它们都是高达‘百仞’、‘长数千丈’的神木大树，应该说它们也具有古代人上下于天的‘天梯’资格的了。”^①

上述各类文献中的“天梯”观念与萨满教的“天梯”观念基本相同。日本学者松树武雄在《诸民族的世界形体观与环境》一文^②中提出，《淮南子》中的不周山、《山海经》中的昆仑山都相当于萨满教宇宙观中的“天柱”。而长在昆仑上的建木则更具神话性。王增勇认为“建木宏伟高大，生长在处于天地之中的昆仑顶巅，是神灵升天的阶梯。”^③ 在萨满教观念中宇宙树往

^① 张福三、傅光宇：《原始人心目中的世界》，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3 页。

^② 见《民族学研究》新第 1 卷第 12 号，1943 年（昭和 18 年）。

^③ 王增勇：《神话与民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2 页。